

# 凤翔南指挥西村商周墓地再析

罗汝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 100871)

关键词:畿内分封 陶器编年 墓地形成过程 族群结构

摘要:本文利用近年来陕西大周原地区商周时期陶器分期编年的新认识,重新讨论凤翔县南指挥西村商周墓葬的时代与墓葬内涵的差别,进而探索西村墓地的形成过程,并观察“新族群”融合的历史经过,透过小型聚落的族群重组以研究周人分封制度的发展。

KEY WORDS: Enfeoffment system in the capital area Chronology Cemetery formation Structure of ethnicity

ABSTRACT: Based upon the latest study of the Shang-Zhou ceramic chronology in the Big-Zhouyuan (Dazhouyuan) area in Shaanxi,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trapolate a more accurate chronology and cultural vari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Xicun tombs in Fengxiang. The new chronological study can shed insight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cemetery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cess of the assimilation of a new ethnic group. Finally, the re-organizing process of ethnic groups in small-sized settlements can push boundaries of the study of ethnic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erial Enfeoffment system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 引言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乃周公于三监之乱后通过分封诸侯以稳定周室、外御其侮之策。关于周人分封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据文献记载,周人从古公亶父时迁岐下,开启了“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的时代,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才形成了“甫有上下,迨受万邦”的周王朝。这百年的历史中,既有刀光剑影的战争,如王季时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的诸戎之战<sup>[1]</sup>,文王时“伐犬戎”、“伐密须”,“伐崇侯虎”<sup>[2]</sup>等等,也有“西伯阴行善”“诸侯皆向之”的外接连横。另有一点很重要,即周人族群内部的重新组合。周人其血亲独尊与排外意识并不十分强烈,从姬姓族形成之时起即与姜、媯等异姓亲族累世联姻<sup>[3]</sup>,以改变自身“小邦周”的政治力量。由此可知,周人分封制度的形成有着漫长并不断完善的发展史。目前由于考古发现的现状,分封制的讨论多依赖于畿外诸侯国的案例,本文拟以小见大,以畿内地区普通的小型聚落族墓地——陕西省

凤翔县南指挥西村商周墓地的发展史为视角,对周人分封制之实况进行讨论,以期提供更具普遍性且时代较早之案例。

南指挥西村商周时期墓地位于村西300米处,雍水南岸,距雍水近4公里,属三嵎原范围之内。整个墓地南北长约127、东西长约129米,墓葬数量约有210座。西村墓地是周人畿内地区一处低等级墓地,但其发掘较为完整,年代跨度较大,是周人墓葬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往对西村墓地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简报本身对出土器物类型学、墓地年代、文化因素、墓地性质等问题的初步综合研究<sup>[4]</sup>;其二是西村先周时期遗存的年代学与文化因素研究<sup>[5]</sup>;其三是专门的墓地研究<sup>[6]</sup>,即基于墓地陶器的详细分期,结合墓葬多种信息进行分区、分组的研究,对于讨论墓地性质、文化因素、族属的问题提出了更为合理的结论;其四是专项的课题研究,主要有根据西村墓地出土人骨鉴定的情况对其性别、年龄、人种和族属等方面进行的讨论<sup>[7]</sup>。

综合过往对西村墓地的研究,其基础的年代学认识多与简报本身的分期年代意见相近,对墓

地形成年代与各时期墓葬的判断并无大的差异。但随着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推进,特别是以周公庙遗址为起点的大周原考古的展开,积累了大批地层关系明确的陶器分期材料,并且西村墓地与已有工作的诸遗址距离甚近,其分期对比的结果更为可靠与准确,因此有必要对墓地年代进行再认识,从而可进一步更为准确地认识墓地所含之历史信息。

西村墓地的性质,已有学者明确提出其为“国民族葬”的邦墓<sup>[8]</sup>,可知墓地必然是一个有着相近习俗的整体。但墓地中亦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因素与不同时代的葬俗变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族的特征,应该有着更为细微的族内区分。正如以往所研究,西周初年的分封对社会族群结构进行了一次调整,虽然仍以商代遗留下来的族内聚集为更核心的组成单位,但也存在着新融合人群的文化因素<sup>[9]</sup>,如何鉴别不同人群所构成的新族群,需要结合材料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

#### 一、西村墓地陶器编年的再思考

西村墓葬的年代判断主要依据的是出土陶器的年代学分析,尤以陶鬲形制丰富、变化明显可资为分期的关键。简报中陶鬲共分为六型,年代跨度约从先周中期至西周中期。近年丰镐遗址、周公庙遗址等先周文化遗存多有发现,对原有认识的一些先周时期陶器年代提出了质疑。如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一书中,专门论证了西村墓地中最受关注的高领袋足鬲的年代上限为先周晚期<sup>[10]</sup>,部分也可能进入西周初年。当然也应看到西村墓地简报中对出土器物,特别是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十分详尽,将众多形态各异的陶器进行恰当地归类,这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讨论基础。

结合新材料相互对比,墓地年代的上限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修订,但下限的认识仍是一致的,即墓地的使用时代大致应为先周晚期至西周中期。这样就为墓地的形成过程研究限定了较为明确的范围。而西村墓葬的年代,主要问题在于西周初年与西周早期的陶鬲年代判断,由于时代跨度较小,且形制种类丰富,考虑到不同遗址

之间器物特征差异的必然性,单纯通过类型学跨区域对比显然很难达到准确地区分与认识。所以结合新材料,仍需要利用一些新的考察角度去对墓葬年代进行重新判断,第一步既将墓地中较为准确的时代坐标给以明确,以求较好地辅助难点的分析。

上文提及雷兴山对西村墓地先周时期的陶器进行了专门的讨论,重新认识了西村高领袋足鬲的年代,这一有着大量考古材料为例证的论断颇为重要,也就可较好地限定墓地的上限。而同文还认为其他陶鬲如简报 BI 式、DI 式、DII 式、FI 式、FII 式年代可归于商代末期,与高领袋足鬲同时。需要指出,部分结论雷亦出言谨慎,可以看出其似保留有以上部分陶鬲时代略晚的可能<sup>[11]</sup>。很明显,分析的关键在于 DII 式、FI 式、FII 式(见图六)三类陶鬲的年代。

首先,由于 80M77 同时出土 FI 式、EII 式鬲,可知 FI 式鬲的年代应与 EII 式同时,而 E 型鬲的年代总体而言应已进入西周时期<sup>[12]</sup>,同时考虑到 FI 式鬲数量很少,故可推测含 FI 式鬲的墓葬年代也当晚于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早期墓葬,绝对年代上限则约不早于西周初年。

从时代较为准确的三类早期陶鬲(A 型、BI 式、DI 式)(见图二)的特征观察,可以发现西村墓地中早期陶鬲相对于偏晚诸型陶鬲皆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特征,即陶鬲裆部皆较高,且瘿裆状态亦更为突出。而进入西周时期的陶鬲裆部基本统一的表现则为平裆的特征,这应是后期突变的文化因素,随着时代的推进这一特征更为明显,陶鬲裆部也越发显得低矮。故笔者认为高裆现象应该是西村陶鬲中,至少是墓地偏早阶段判断早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后文也可通过墓葬分布情况进一步对比考察此类现象。从此标准看,EII 式鬲可能早于 EI 式,与 FI 式同时。同样 DIII 式的年代与 DII 式当有较大的重合。一般认为 DIII 式鬲已进入西周时期,则 DII 式的年代也应晚于 A 型等早期陶鬲,主体已进入西周时期。

讨论墓葬下限的情况,通过对比周原遗址西周陶鬲的状况,可知简报中唯 FIV 式陶鬲具有典型西周中期或偏晚的陶鬲特征<sup>[13]</sup>(图一)。另外 80M103 同时出土 FIII 式、EIV 式鬲,可见二者同时。该墓尚出土一陶簋、一陶壶,陶壶在西



图一 西村墓地偏晚阶段陶器比较图

村墓地中仅此一件，其临近的北吕墓地亦仅有一件出土，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4件。该类器物仿铜器特征颇为明显，数量较少，却更能反映不同遗址文化交流的情况，时代指示性更强。西村80M103出土陶壶对比张家坡墓地二期的M29:14陶壶<sup>[14]</sup>，二者形态基本一致，年代应相近。同样对比张家坡墓地一期的M318:2陶簋<sup>[15]</sup>，西村80M103出土陶簋与其形态基本一致，唯西村陶簋口部平沿，灰陶火候似更佳，推测其年代可能略晚（图一）。参考张家坡西周墓地的编年，西村80M103应相当于张家坡遗址第二期，约西周昭穆时期。如此，FIII式、EIV式鬲的年代也应为西周中期偏早。

通过统计随葬陶器组合的类型还可发现（表一），DIV式鬲的主体年代也应为西周中期。因为AVI陶罐的年代，雷兴山明确指出为西周早期偏晚<sup>[16]</sup>，则“DIV陶鬲+AVI陶罐”的组合时代上限应不超过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同时观察DIV陶鬲所有的高罐组合情况可知，与之组合的陶罐，多与FIII、FIV、EIV等西周中期陶鬲相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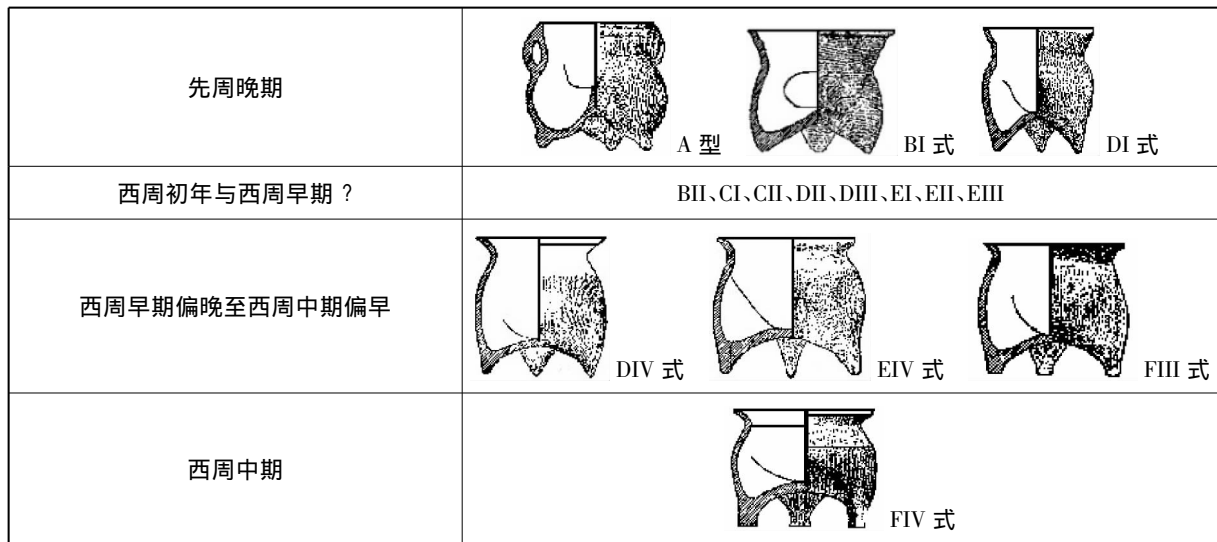
表一 西村墓地高罐组合统计表

随葬陶罐	同墓随葬陶鬲形制	随葬陶罐	同墓随葬陶鬲形制	随葬陶罐	同墓随葬陶鬲形制
AI	DII、EI、EIII	BI	FI	CI	EII
AII	CII、EI、EII、EIII、FII、FIII	BII	AIII、EIII	CII	DII、EIII、FI
AIII	CH、DIII、EIII、FIV	BIII	DII、DIII、EIV、FI、FII	CIII	CII、DIII、EIII
AIV	CI、DIII、DIV、EIV、FIII	BIV	DIV、EIII、EIV	CIV	CI、DIII、FII、FIV
AV	DIV、EIV、FIV	BV	DIII、EIII、EIV、FIII	CV	CI、FIV
AVI	DIV				

则可以推断DIV陶鬲年代至少应与西周中期偏早的FIII、EIV陶鬲相近。当然也需看到，西村墓地出土陶罐按照简报的分类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西周时期各时段的差别，这一点颇为遗憾。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先周时期陶鬲包括A型、BI式、DI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部分进入西周初年的可能），而DIV式、FIII式、FIV式、EIV式陶鬲年代不早于西周早中期之交，排除这些时代较为明确的陶鬲，其他诸式陶鬲的年代范围应当就基本都集中于西周初年和西周早期（见图二）。

上述时代未明确之陶鬲，从形态特征对比看，器形差异仍较大（见图六），其绝对年代的范围尚不能完全确定。且在西周早期如此短暂的时间范围内区分陶鬲演变的早晚，单纯通过类型学对比必然显得单薄。从陶鬲整体情况看，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陶鬲器形向统一化发展，明显区别于早期形态多样的特征。下文笔者将随葬相同形制陶鬲的墓葬分群，从已知有联系的群体去辨别群体间的相互差异与关系，望有助于分析短时段内的纵横关系。



图二 西村墓地时代明确的陶鬲统计图

## 二、墓地形成过程与族群结构试析

以随葬不同形制陶鬲为标准区分墓葬群,是由于简报中排列的不同形式的陶鬲,其本身即是墓葬同时期的标准。另外,亦可反映出使用人群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联系。这种时间轴与社会习俗的联系也必然是墓葬分群的依据。

具体的分析思路为,首先观察已知点的墓葬分布状况,如先周晚期墓葬分布状况、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葬分布状况等;再逐个观察未确定的陶鬲墓的分布状况,寻找与早晚阶段分布状态相近的案例,进行归类分组,以区别其早晚关系。建立墓葬分布组合的序列之后,再通过陶器形制分析、其他出土遗物分布状况分析等信息对建立的序列进行对比考证,以求寻找规律,探索历史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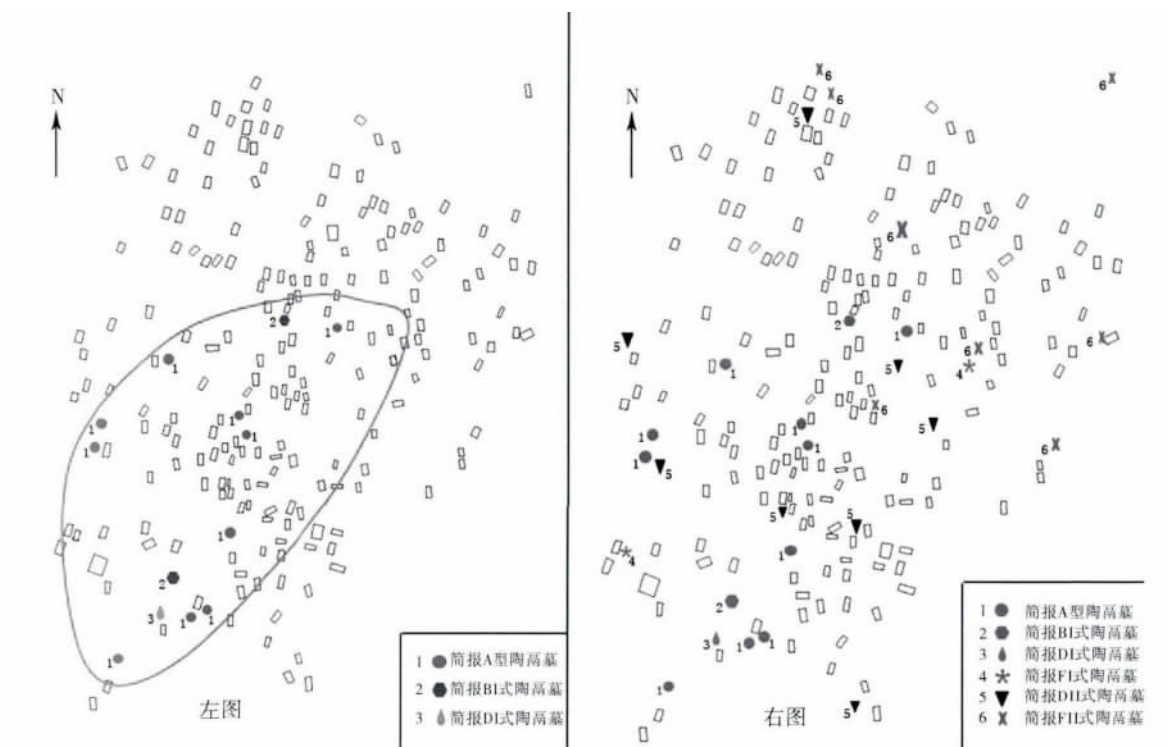
参考雷兴山对于西村陶器的分期意见,从雷文对先周时代判定最为明确的几种型式陶鬲观察,可以看到随葬 A 型、BI 式、DI 式陶鬲墓为典型的先周晚期遗存。从图三左图中可以看到该群墓葬在分布上,明显集中于整个墓地的西南部分,整体规划限定于一个东北—西南向狭长的区域内。而对比图三右图,从含 DII 式、FII 式陶鬲的墓葬分布情况看,这两类墓年代略晚于第一阶段,在墓地规划分布上,有着一个明显地扩张现象,特别是随葬 FII 式陶鬲墓分布范围基本脱离

了原有的墓地规划范围;另一方面, DII 式陶鬲与 DI 式陶鬲在器形上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其分布仍居于南部墓地传统规划的范围,只是其分布位置更为广泛,故与早期有着一定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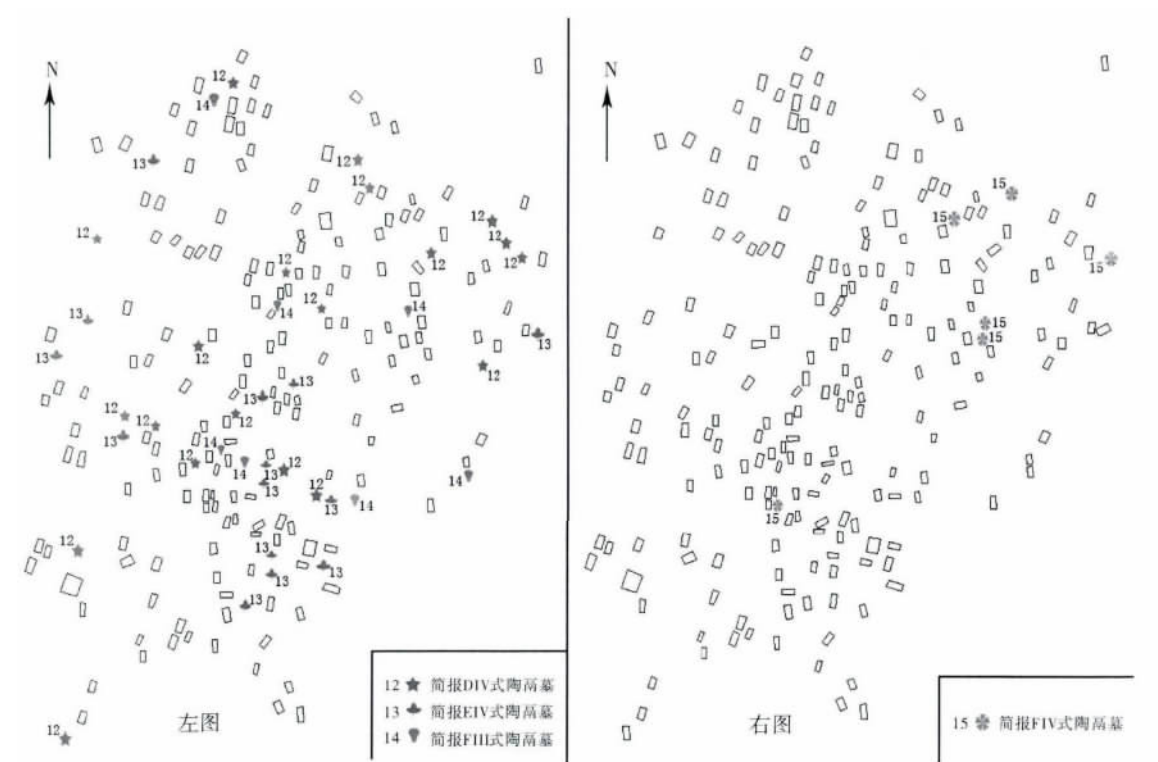
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 DIV 式、EIV 式、FIII 式陶鬲随葬墓(图四,左图),其分布状态则打破了先周晚期的墓地规划,墓葬基本覆盖整个墓地范围。而进入西周中期或偏晚阶段后(图四,右图),墓葬数量明显减少,含 FIV 式陶鬲的墓葬分布基本仅局限于墓地东北隅。

以墓地晚期布局规律为基点向前推导,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以后的墓葬分布,相对于最早一期的墓葬分布明显出现了安排上的变化,而这样的布局变化在 EII 式、CII 式、EI 式、EIII 式陶鬲墓的分布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墓地使用率达到顶峰,墓葬散布于整个墓地之中(图五,左图)。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上述四式陶鬲从器形上看也已经趋于相近(图六)。而单独观察 DIII 式陶鬲墓分布的情况,却与先周晚期东北—西南向分布规律多为一致(图五,右图),且亦符合 DII 式陶鬲墓阶段扩张的特征,这似乎暗示着三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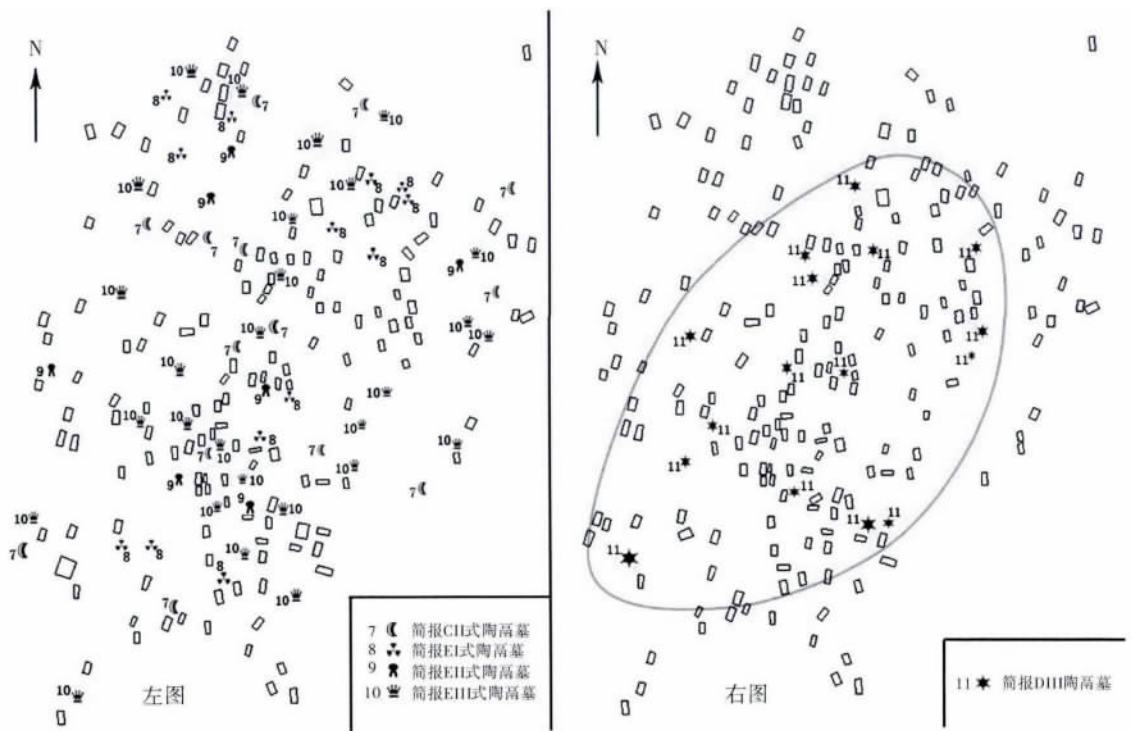
对比 CI 式、FII 式与 DII 式、FI 式、BII 式陶鬲墓的分布状态,却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分布规律。特别是 CI 式、FII 式陶鬲墓,其墓葬分布规律与年代较为接近的先周晚期墓葬有着截然的不



图三 西村墓地时代明确的陶高墓分布图



图四 西村墓地先周晚期墓葬分布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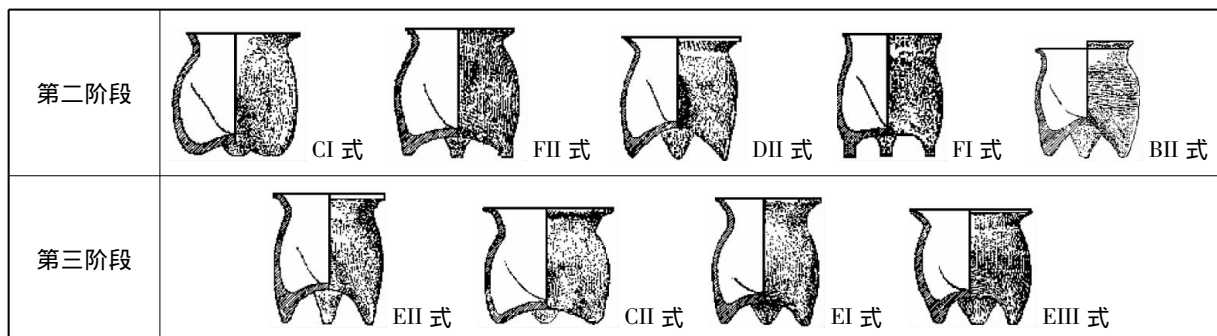


图五 西村墓地第三(左图)、第四阶段(右图)的墓葬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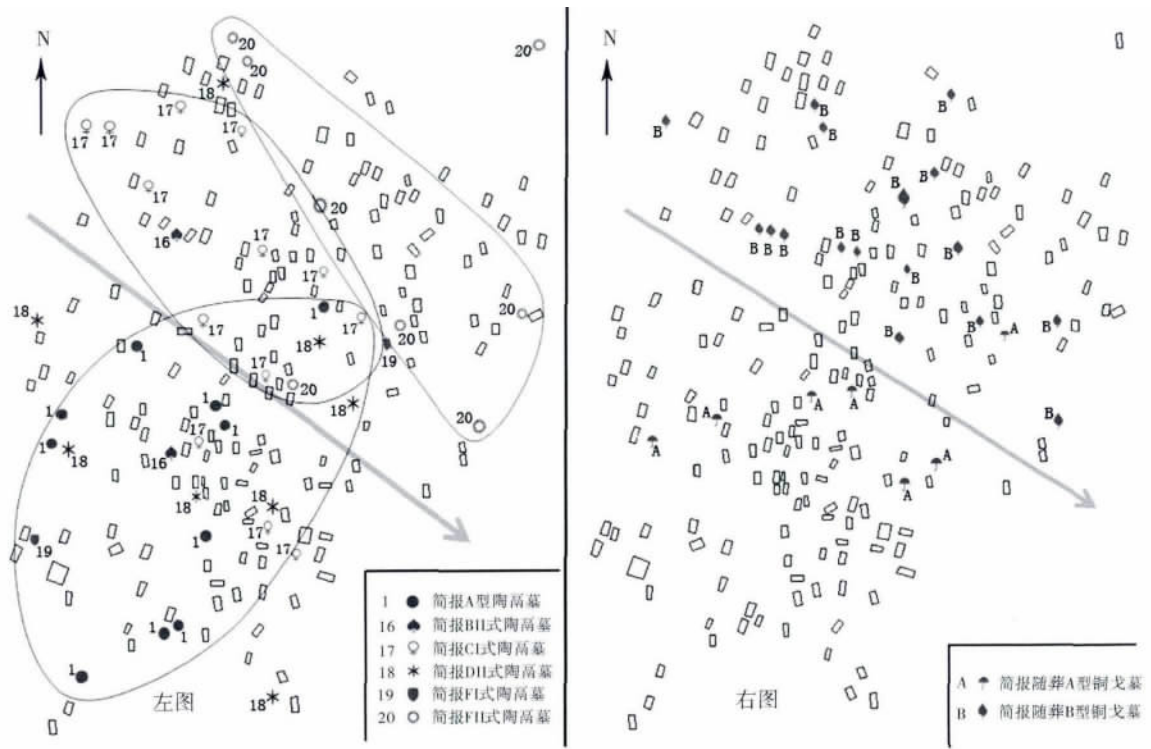
同。FII 式仅分布在墓地东北隅,墓葬整体分布的方向大致是西北—东南向(图七,左图);而 CI 式分布较 FII 式略偏南,但主要墓葬的分布也基本集中于墓地偏北的位置,整体亦呈西北—东南向的布局(图七,左图)。反观 DII 式、FI 式、BII 式陶鬲墓(图七·左图),主要分布于墓地偏南的位置。这三式陶鬲墓的分布范围虽较先周晚期有所扩大,但基本都围绕在原有墓地规划上,整体布局呈东北—西南向扩展。综上,CI 式、FII 式与 DII 式、FI 式、BII 式陶鬲墓,其分布虽个别有所交叉,但整体尚能区分出南北之别与规划差异,这两种不同的择地分布状态,也可推测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区别。

回顾上文,需要注意前述五种陶鬲从器形上看,形制复杂多样。比较 CII 式、EI 式、EII 式、EIII 式等陶鬲(图六),除 EII 式瘠裆明显、裆部偏高与前期诸鬲相近外,其余三式口部卷沿、裆部低矮、瘠裆程度减弱这些特征趋于一致,也就是说陶鬲整体形态开始统一化。而其后的 DIV 式、EIV 式、FIII 式陶鬲(图一)也能发现同样的器形统一化规律。前文已提及 FI 式与 EII 式同时,年代较 EI 式早,这里对比两个群体差异,亦可补证前述。故而,从 EII 式开始的新的墓葬布局,应当反映了早晚阶段之间的过渡。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四个时期墓地规划上的变动:



图六 西村墓地第二、第三阶段陶鬲



图七 西村墓地第二阶段墓葬分布图以及出土铜戈墓葬分布图

表二 西村墓地随葬铜戈、铜泡墓葬统计表

墓号	鬲	戈	泡	墓号	鬲	戈	泡
79M29	CI	BII2	II × 2	80M57	EI	BIII	I
79M32	CI	BIII	I	80M128	EI	BII	II
79M81	CI	BI		80M10	EII	AIII	
80M51	CI	BII	I	79M62	EIII	AI2	II
79M37	CII	BII	I	80M111	EIII	BI	
80M125	CII	BII		80M119	EIII	BII	
79M35	BII	BII2	I × 1 II × 1	80M27	EIII	AIII	I
79M5	DII	AI		80M29	EIV	AII	
80M19	DII	BII	I	80M112	FII	BI	II
80M22	DIII	AII	I	80M144	FII	BIII	
80M43	DIV	BIII		80M47	FII	BII	
80M132	DIV	AIII		80M45			I
				79M36		BII	I

第一阶段,先周晚期,墓葬分布于墓地偏南部的狭长地带,呈一个东北—西南的布局走向。

第二阶段,进入西周时期,墓地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布规律:甲类,以早一期的分布规划区为基础,墓葬基本集中于该区域内,但具体位

置上有一定的扩张趋势;乙类,打破早一期的墓葬分布规划,趋于墓地偏北的位置,虽南缘与早期规划范围有所交叉,但墓葬整体分布走向为西北—东南向。

第三阶段,墓葬分布出现了全面铺开的状

态 随着陶鬲形制的逐步统一,墓葬分布也出现了广泛布局的特征,难以区分早期规划与新规划两个群体间的界限。

第四阶段,墓地规模急剧下降,墓葬集中于墓地东北隅。

此墓地布局的变动,到底是何种原因所致,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为更好地考虑各类陶鬲墓的形成动因,除墓葬分布特征外,也需参考墓葬的内涵特征。

结合西村墓地出土铜兵器统计表(表二)和出土铜戈墓葬分布图(图七,右图),可以发现颇为有趣的现象:其一,西村墓地中年代最早的陶鬲墓(A型、BI式、DI式陶鬲)中皆未见兵器出土,这一点也明显将兵器随葬墓与早期墓葬从年代上进行了区分。而大约进入西周时期,西村聚落在军备安排上当发生了一次明显的改变。其二,进入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墓地兵器随葬的现象大大减少,FIII式、FIV式陶鬲墓也未见兵器出土。其三,墓地出土铜戈可分为两型,而这两型铜戈随葬墓在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分,B型铜戈墓分布位置全部集中于墓地北部,这与上文提及墓地第二阶段新出现的乙类墓葬分布规律相同;A型铜戈墓分布位置靠南,约在整个墓地中部区域,两类铜戈的形态以及各自墓葬的布局皆不同,在两类铜戈墓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则与前文墓地规划第二阶段出现的甲、乙两类墓群的分界线基本重合。从这一点看,更反映了墓地中存在不同人群的区分。

另一方面,西村墓地其聚落等级较低<sup>[17]</sup>,排除少数被盗的墓葬,出土铜礼器的墓葬仅有4座,为79M42、80M80、79M62、80M112(78M42为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前二者出土的陶鬲为DIII式,79M62出土EIII式,80M112出土FII式,四墓年代基本同时,分布上仅80M112位于墓地北部,其余三墓皆在南部。从这点联想到铜戈的情况,A型戈数量较少,为三角缘铜戈,制造工艺较B型戈考究,故从社会财富上观察,亦可推论南部传统集团相对北部更有优势,二者存在差异。

结合第二阶段墓葬分布的不同与出土铜器分布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西村墓地在进入西周之后,社会人群出现了分化。从铜戈的使用上看,A、B两型沿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则说明至少到第

三阶段,人群的区别依旧存在。但第三阶段从陶器分布上已看不出两个人群之间的区别。结合陶鬲形制趋于统一的现象,可推测进入第三阶段的西村聚落在社会生产方面应较前一期有着更为统一的规划,使得陶器不再能反应人群之间的差别。

至此,在西村墓地使用的前两个阶段,通过随葬陶鬲的不同,大致可区分为两类人群:甲组,是代表着聚落原始居住的人群,包括早期A型、BI式、DI式陶鬲使用者;第二期的DII式、FI式、BII式陶鬲使用者;乙组,为第二期CI式、FII式陶鬲使用者。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甲组的早期墓葬群以随葬单件高领袋足鬲为主,且可见少量随葬横绳纹鬲与联裆鬲墓。墓葬形制皆为竖穴土坑,此类葬俗特征的墓,参考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对于先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分类,其与先周中期的“王家嘴类”墓葬特征基本一致,并与其后先周晚期延续发展的“碾子坡晚期”墓葬一类也颇为相近,仅未见晚期常见的壁龛现象<sup>[18]</sup>。但按前文图五所示,在遵守传统墓区规划的DIII式陶鬲墓中(79M42、80M80)却发现了前期“碾子坡晚期”墓葬类型中未见的头龛现象。这两座墓葬为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二墓的主人身份自然应该是家族族长一类的人物,其反应的墓葬习俗特征也应更好地体现了家族传统的延续。这样可见DIII式陶鬲使用者的身份也应属于甲组人群,且可以进一步确认,西村墓地中传统的甲组人群应与“碾子坡晚期”类型同源。进入西周初年,另一支带有较强军备性质的乙组人群加入聚落,形成了新的部落人群结构。两组人群不断融合,共葬于同一墓地,完成“新族群”形成的历史使命,直至西周中期聚落衰落。

### 三、结语

许倬云总结前人研究,概括西周时期周人分封包括“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然后进行“人口的再编组”,经历“赐姓”、“胙土”、“命氏”的分封过程,而且“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要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



春秋的列国制度”<sup>[19]</sup>。许先生的总结,虽然主要依赖于西周时期的畿外诸侯分封的实例,但其强调的新族群融合与地缘性政治单位的形成,却恰合西村墓地形成过程的经历。“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是独立族群的识别标志之一,西周初年西村墓地人群的融合,有传统的延续,亦有新异的差异,在两股势力保持自我风俗的基础上,开始在社会生活等方面不断形成共识,产生统一化的趋势,最终完成新族群形成的历史使命。而这种尊重传统相互磨合的发展模式,亦正合《左传·定公四年》所说“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周人政治策略。

- [1]方诗铭,王修龄. 古文竹书纪年辑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6-37.
- [2]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17-118.
- [3]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234.
- [4]雍城考古队,韩伟,吴镇烽.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J]. 考古与文物,1982(4).
- [5]关于凤翔先周时期遗存年代的研究论文较多,特别是对墓葬出土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先周陶器研究尤甚,基本涉及先周文化探索的论文皆有提及西村遗存.
- [6]a. 刘军社. 凤翔西村先周墓葬分析[J]. 宝鸡文博,1993(2)

- (3). 周秦专号. b. 马赛. 凤翔南指挥西村墓地与扶风北吕墓地比较研究[D]. 历史学本科——北京大学,2004. 05. 30.
- [7]a. 韩伟,吴镇烽,马振智等.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测量与观察[J]. 考古与文物,1985(3). b. 焦南峰.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初步研究[J]. 考古与文物,1985(3).
- [8]同[6].
- [9]同[3]:425.
- [10]雷兴山. 先周文化探索[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99.
- [11]同[10]:200-201.
- [12]同[10]:200.
- [13]a. “99 齐家 IVA1M15:1 陶鬲”参考 黄曲. 周原遗址西周陶器谱系与编年研究[D]. 历史学硕士——北京大学,2003. 05.30:10. b. “99 齐家 IA1M9:65 陶鬲”参考 周原考古队. 1999 年度周原遗址 IA1 区及 IVA1 区发掘简报[C]//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古代文明(第2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家坡西周墓地[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27.
- [15]同[14]:110.
- [16]同[10]:200.
- [17]同[6]b.
- [18]同[10]:221.
- [19]许倬云. 西周史[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50.

(责任编辑 李自智)

## 本刊编辑部可邮购以下书刊

(价格均为人民币元,免邮资)

《考古与文物》精装合订本 1980—2011 年,每册 150 元。

《考古与文物》部分单行本,每本 12 元,现有:

91 年 1、4—6 期      92 年 1—5 期

93 年 1、4、6 期      94 年 5、6 期

95 年 2—6 期

《史前研究》1986、1987 年精装合订本每册 80 元;

1990—1991 年辑刊每册 20 元

《考古与文物 100 期总目录索引》每本 10 元

《中国考古学论集》每本 20 元

《古文字论集》(二) 每册 20 元

《古文字论集》(三) 每册 30 元

《考古与文物》2002 年先秦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2 年汉唐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4 年先秦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4 年汉唐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7 年先秦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7 年汉唐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